



中国古代

玻璃

鉴赏图录

文明修
松雪修 编著

图文并茂，演绎中国古代玻璃器的发
展轨迹；精心点评，全面解析中国古
代玻璃器的工艺、审美特点及珍稀程
度；清晰的脉络，丰富的品类，详细
的解说，倾情为您奉献一部中国古代
玻璃器鉴赏与投资珍贵宝典。

「中国民间藏宝鉴赏丛书」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鉴赏图录

中国古代玻璃

修文明 修雪松 编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峰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玻璃鉴赏图录 / 修文明, 修雪松编著. —合肥: 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5398-1564-0

I. 中… II. ①修…②修… III. 玻璃器皿—鉴赏—中国—古代—图录 IV. K876.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313号

中国古代玻璃鉴赏图录

修文明 修雪松/编著

*

安徽美术出版社

精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60千字 印数 1—3000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98-1564-0

定价: 78.00元

序言

《中国古代玻璃鉴赏图录》一书付印前，作者邀我为之作序，我深感责任重大。目前，我所参与的国内第一个专题玻璃博物馆正在筹建中，工作之余读了《中国古代玻璃鉴赏图录》初稿，认为更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国内对古代玻璃的收藏及研究。故写些心得，权充序言。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辽阔的神州大地上，到处都保存着先民们生息繁衍、劳动开拓的印迹和丰富的历史遗物。这些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有力见证，同时也是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其中，古代玻璃就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珍。我国古代有比较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为玻璃制造技术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冶铜过程中，人们得到一种绿色并含有玻璃成分的物质，逐渐发现这种物质具有美丽的色彩与光泽，进而用来制作各种饰物。中国最早有关玻璃的记载，应是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中提到的“璆琳”，另有“琉璃”“琉璃”“玻璃”等名称，而使用“琉璃”这一名词最为普遍。据考古研究，中国早期的玻璃制造大约产生于西周早期，主要用于装饰性的玻璃管、珠。魏晋南北朝之后，西方的玻璃制作技术传入中国，推动和丰富了中国玻璃制作技术的革新和品种。元明以后，政府成立了专门的造办机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以往高贵的玻璃饰品也扩大了使用范围，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中国古代玻璃鉴赏图录》一书以丰富的资料和600余幅珍贵的实物照片，为读者展现一个璀璨夺目的玻璃世界。在书中，作者对每件玻璃器物都详细地标注了其名称、流行使用年代、规格、生产制作工艺、个性化特征以及用途和珍稀度。其中许多藏品都是第一次披露于世，且部分藏品尚属孤品，极具收藏和研究价值。尤其是我们平时非常少见的明代玻璃花饰，在本书中也多有展示。同时，作者对明代玻璃饰品存世很少的原因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很有见地。

该书行文简洁，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如果您能认真阅读此书，就会循着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对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玻璃的历史传承有进一步的了解，眼界顿开，受益匪浅。

承蒙作者信赖，撰写此序，并祝此书顺利出版。



2009年9月5日

前言

古代玻璃器是一种具有较高收藏价值和文物价值的艺术品，正逐渐被具有远见的收藏家们所青睐。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其研究的逐渐深入和民间收藏家视野的不断拓展，古代玻璃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许多爱好者和专业人员对其进行收藏和研究，成为众多收藏品中的新宠。尽管时下的收藏品五花八门，而古代玻璃当属最难收藏的品种之一，其稀缺性可见一斑。

当前，世界上主要收藏古代玻璃的博物馆和展览馆有二三十家，而专门的博物馆和展览室就有十二家，如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和日本硝子公司古代玻璃陈列室等。在国内，我国第一家涵盖古代玻璃的专业性玻璃博物馆已在秦皇岛市落成，并将于近期对外展出。同时，一个群众性的“古代玻璃收藏协会”也正在酝酿之中。这些都将为广大古玻璃收藏者和研究人员带来诸多方便。

在我国，古代玻璃器的存世量相对较少，加之对其研究的历史尚短，还没有形成像玉器、瓷器及金石等文物大类那样完整的体系，更不用说建立确切的古玻璃断代标准器系统。同时由国外传进我国的古玻璃器的具体年代等问题还无定论，我国古玻璃成分的演变和古玻璃技术史尚存许多疑点，加之有些年代和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古代玻璃实物及图录较少，如有关东北地区和明代古玻璃都很少谈及，这些，都为古代玻璃的收藏者与研究人员带来了许多困惑。对此，爱好者们都在热切地盼望能够见到更多的有关我国古代玻璃的研究成果和相关的收藏鉴赏方面的书籍，以进一步推动对古代玻璃的收藏和研究。

如今，有关收藏类的书籍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而涉及古代玻璃收藏与鉴赏方面的书籍则显得凤毛麟角，实在是太少了。

我国最早较详尽介绍古玻璃的著作是清代孙廷铨的《颜山杂记·琉璃》。该书出版于1665年，内容包括生产琉璃的原料、熔制、着色、产品分类及制作工艺等等，为今人了解中国古代玻璃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依据。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些有关我国古代玻璃的书籍相继问世，如冯乃恩编著的《古代玻璃鉴赏与收藏》、干福熹等编著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王进编著的《琉璃》、台湾韩韩编著的《中国古玻璃》、香港关善明编著的《中国古代玻璃》以及沈从文编著的《玻璃史话》和张荣编著的《故宫收藏玻璃器》等等。同时几位著名专家学者如安家瑶、齐东方、杨伯达、张维用和高至喜等先生

也撰文论及。这些书籍及论文大多是从学术角度对中国古玻璃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披露了一些国内对古代玻璃技术发展的研究成果，从而帮助爱好者对我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发现、发展过程和历史与西亚各国古玻璃渊源、差异与交流等问题都有较新、较全面的认识，有助于收藏者理清其发展脉络，使之受益匪浅，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内对古代玻璃的收藏与研究。

纵观这些书籍，作者发现在论及我国古代玻璃器的区域分布与特征时，唯独很少涉及东北地区，而明代玻璃器则更少谈及，甚至有的以“明代玻璃少”一语过之。同时，书中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以及明代的玻璃实物图片太少，观后未免有缺失之感。

在作者居住的城市及周边地区，多年来由于农田基本建设及砖厂施工作业，不时有元、明时期的墓葬被发现，同时出土了许多青花及五彩瓷器等。在出土的青花瓷当中，有些底部明确书写“大明年造”纪年款，以及晚明时期的“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伪托款。在出土的五彩瓷中，有些则书写着“大明年造”等纪年款。其中一些瓷器分别被省、市博物馆收藏，还有一部分已被国家博物馆征调并列为馆藏。伴随这些瓷器一同出土的古代玻璃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流失，甚至损毁。当作者第一次看到这些元明时期的古代玻璃时就被其深深吸引，萌生了收藏古代玻璃的想法。至此，作者对散失在民间的古玻璃进行了抢救性的收集与整理，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历经数十载，至今已小有成就。目前收藏的具有东北地域特色的少数民族古代玻璃器，尤其是元明时期的古代玻璃器，以其品种之繁、数量之多在国内外已独占鳌头。为了推动古代玻璃的收藏与研究，笔者特将自己收藏的部分藏品披露于世，辑成此书，以飨同好。

此举如能对古代玻璃的收藏与研究起到推动作用，乃至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则深感欣慰，这也是笔者推出该书之初衷。

此书乃疏浅之作，难免有所遗漏，为防谬误流传，敬请方家指正。

此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秦皇岛玻璃博物馆郭绘宇先生的大力协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009年3月20日 于京华璆琳轩



目录 | Contents

东北古代玻璃器发展考略 / 1

中国古代玻璃器的制作与演变	2
东北古代各少数民族文化概说	3
东北古代玻璃器的制作与发展	4

古代玻璃器图谱 / 7

春秋至两汉	9
隋唐至宋辽金	11
元明时期	19
清代	176

附表 东北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玻璃器出土文物简编 / 184

东北古代玻璃器 发展考略





中国古代玻璃器的制作与演变

我国最早有关玻璃的记载始见于《尚书·禹贡》，该书把冶炼青铜或炼丹时所形成的类似玉的一种副产品称之为“璆琳”，其意为美玉。《楚辞》中也多次出现“陆离”一词，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玻璃。另《佛说阿弥陀经》中有“极乐国土有三宝，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的记载，可见当时所译佛经中“琉璃”与“玻璃”是经常并用的。琉璃为佛家七宝（金、银、琥珀、珊瑚、砗磲、琉璃、玛瑙）之一，据说得三宝而国泰，得七宝则民安，可见当时对琉璃的崇拜程度并非一般。

中国古代玻璃的起源可追溯到西周时期，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源远流长。目前，国内出土的西周玻璃器数量很少，仅见一些蓝色、绿色及白色的珠、管类器物，且质地疏松，均不透明。对其进行的化验检测结果表明，其内部主要是晶体状的二氧化硅，而不是玻璃态，铅和钡的含量较高，不同于国外的钙钠玻璃，故有人认为可称其为中国的“原始玻璃”。

春秋至战国初期的玻璃器数量很少，且品种单一，仅有各种玻璃珠、管和嵌在剑饰上的小块玻璃等。到了战国晚期，玻璃器的数量及品种均有所增加，出现了璧、剑饰、印章等，一般的士和庶民也可以用玻璃随葬。玻璃珠多呈球状，少数作橄榄形或棱柱形，中穿小孔，体积一般略大于战国早期珠子，直径1-2厘米。玻璃管多呈圆柱体，少见棱柱体，一般长2-4厘米。在蜻蜓眼式的珠、管上，往往有蓝白相间的圆圈纹及由蓝、白色小点相连组成的菱形纹等。此时，玻璃璧已出现并一直延续到汉代。玻璃璧的形状与玉璧相同，有蓝、绿、乳白、米黄等颜色，其纹饰较为简单，多为谷纹和云纹。剑饰有剑首、剑格、剑珌、剑璲等，其纹饰的种类在璧纹饰的基础上增加了柿蒂纹、兽面纹和蟠螭纹等，剑饰一直延续到汉代，仿玉效果很好。战国中晚期的玻璃珠、璧等的成分检测表明，氧化铅含量高达26.51%-48.50%，氧化钡含量一般在5.92%-19.2%之间，属铅钡玻璃，这也是我国汉以前国产玻璃有别于外国玻璃的显著特征。

汉代玻璃器继承了战国玻璃器的传统，但蜻蜓眼式的珠、管越来越少见。玻璃璧的器形一般大于战国璧，同时品种有所增加，出现了耳珰、带钩、蝉形珞及随葬的玉衣的玻璃仿制品。容器类开始出现且颜色鲜艳，但质地脆，用以热酒，即碎。可见当时国产玻璃的质地并不理想，脆而易碎、不耐高温等问题未能得以解决，从而制约了当时本土玻璃器的进一步普及与发展。

汉以前的各种玻璃饰品，均属于单纯的玉的替代品。魏、晋、南北朝时，由于西方玻璃技术的引进，促进了本土玻璃制作工艺的发展。中国已真正掌握了玻璃的吹制技术，出现了一些用于陈设及生活实用器皿，本土玻璃才真正摆脱了单纯玉的替代品的角色。此时也正式出现了“玻璃”一词。汉以前的铅钡玻璃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不含钡的高铅玻璃和碱玻璃。但由于此时我国的制陶、青铜、制瓷、漆器等工艺高度发达，故对玻璃工艺改进的要求不是很迫切，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本土工艺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时期玻璃制作延续了前朝的传统，有高铅玻璃及碱玻璃两种类别。玻璃一词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但此时的玻璃器物仍为皇家及达官贵族所使用的奢侈品，寻常百姓难得一见。

宋、辽、金时期，因为宋瓷的辉煌，玻璃器并没有像同时期欧洲和西亚那样，大力发展技



术，成为日常的生活用品。制作工艺也没有明显的进步，基本上延续了隋、唐玻璃器的传统。尽管颜色、品种丰富了，但质量并没有超越前朝，成分仍以高铅玻璃和碱玻璃为主。铸后再用制玉法进行二次冷加工的玻璃饰物已较为多见，有些花饰的形制，一直影响到元、明时期。

元代的玻璃器，较之两宋及辽、金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元史》中记载，当时朝廷专门设立了制作玻璃的官办作坊——瓘玉局。烧造的“罐子玉”，亦称药玉，是一种仿玉玻璃器。可见当时的玻璃生产还是得到了官方的高度重视。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标本看，元代的玻璃器以珠类及各种头饰为大宗，其他如吹制器则少于宋代。

明代以后的玻璃器根据当时的制作方法，称其为“料”、“烧料”及“料器”等。数量及品种都有较大程度的增加，制作技术仍以热加工为主。南宋以后已少见的吹制器又见复兴，而利用琢玉法再进行二次冷加工的饰品较多见。各种玻璃饰品已大量流入寻常百姓之家，并深受喜爱。一人拥有多件玻璃饰品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一点已被东北地区近年来的出土资料所证实。

到了清代，由于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玻璃生产技术，玻璃制造达到了当时玻璃发展史上的最高峰，品种繁多，工艺技术高超。康熙三十五年（1696），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成立了玻璃厂，制作出的许多玻璃器皿，已成为我国古代玻璃制品中的顶极之作，现多收藏于故宫博物院。据有关文献记载，当时民间的玻璃产地还有博山、广州、北京和苏州等地。仅博山一地在光绪年间每年向外输出的玻璃制品就达七千余担，品种有屏风、棋子、念珠、鱼瓶、葫芦、砚滴、佛眼及簪、珥、珠饰等数十种之多。有些玻璃珠、簪等已出口到东南亚，一些珠类还被转销到北美洲，受到当地印第安人的欢迎。可见这一时期我国的玻璃制造业发展很快。晚清以后，由于外忧内患，国力衰退，所制造的玻璃质量已大不如前。

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得以飞速发展，玻璃制品全面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古代玻璃器则远离了我们的视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纵观我国古代玻璃的发展史，往往给人一种朦胧之感，这是因为我国现存的古代玻璃实物太少，考古出土资料佐证不足，断代标准器尚未形成系统，且很难在史籍文献中得到帮助。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文物界和科技界的广泛关注。我相信，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和科技检验手段的逐步完善，通过广大专业人士及收藏爱好者的共同努力，这一局面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改变，一部真正全面反映我国古玻璃文化的中国古代玻璃发展史，必将展现在国人面前。

东北古代各少数民族文化概说

在我国古代史上，东北地区是北方各少数民族之间不断争逐、迁徙和交流、融合的大舞台，是多民族相互融汇、聚居的地方。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早在商、周时期，居住在白山黑水间的先民们就逐渐形成了肃慎、东胡、濊貊三大族系，并在随后的历史岁月中分别衍生出多个少数民族。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竞相栖息，争雄角逐，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古肃慎人是中华文献记载的东北地区的最早居民，也称息慎、稷慎。肃慎族活动在长白山至黑龙江口之间，东临大海，纵横数千里，在舜帝时肃慎就与中原通贡。这一族系都以长白山为祖宗的发祥地，尊松花江（古称涑末水）为母亲河，皆崇拜鸟图腾，历史上的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及满族人等，依其渊源均属肃慎族系。

东胡族活动在东北北部草原及大兴安岭山脉一带，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强盛一时的北方民族，因居匈奴（胡）以东而得名，也称之为“土方”或“屠何”。东胡人最早以游猎为主，后逐渐发展成农牧业。东胡人很早就有了“王”，到西汉时东胡王狐史去匈奴并要挟其献宝马、让地盘，而召至匈奴人的反抗，匈奴的冒顿单于大举进攻东胡而胜之。《史记·匈奴列传》载：“冒



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东胡族瓦解、分化后的一部分东胡遗民游猎到大兴安岭，与北系东胡族部落融合，成为后称鲜卑与拓跋鲜卑人的先世，后来的契丹、室韦、蒙古等少数民族均为东胡族衍生而来。

濊貊人也是东北的古老先民，濊原为一个氏族，因依濊水而居得名，貊也原为一个氏族，因图腾而得名。两氏族融合成一族系，即濊貊族，据说也是高句丽的族源之一。濊貊族主要活动在东北的中部和南部，北支到了小兴安岭以南的松嫩平原。原以游猎为主，因得益于松嫩平原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后来逐渐发展起农业生产。濊貊族也有“亳人”、“发人”、“白民”等称谓。濊貊族“内服”中原，周朝视其为北方领地，濊貊人是后来在东北地区建立第一个地方民族部落政权——夫余国（也称扶余国）的夫余族之先祖。夫余国与中原关系密切，常去中原朝贡。公元五世纪末被勿吉人打败，并逐渐融合到肃慎及东胡族系之中。

在悠悠的历史岁月中，肃慎、东胡、濊貊三大族系衍生于东北大地，并在此进行着世代的生息和繁衍，频繁往来，纷争不已。先有夫余人及靺鞨族分别建立的“夫余国”和“渤海国”等民族部落的地方政权，又有鲜卑、女真、蒙古和满族相继入主中原或君临神州。历史上，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曾辖黄河南北；女真族建立的“大金国”也曾辖中华的半壁山河；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和满族人建立的大清朝都曾一统华夏。三大族系的人民共同推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及中华江山的大统一。

历史上，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始终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在充分吸收和发扬中原地区汉文化的基础上，利用本民族的聪明才智，不断地创造着各具特色的本民族的文化及物质文明，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其间，古代玻璃也在这两千多年的时间内，在东北地区得到了有序的发展与传承。

东北古代玻璃器的制作与发展

从春秋战国到汉唐时期，古代玻璃便不断地从中原地区传到东北地区，这已被考古资料及现存的出土实物所证实。如1985年吉林省考古所到镇赉县坦途镇的向阳岗子村，对5座战国时期的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5座墓葬的具体年代与汉书二期文化年代一致，应隶属于东胡族。其中M1、M2两座墓的主人均为女性，在清理过程中发现M1墓主人的口中含有一枚蓝色的料环，直径0.7cm，M2墓主人口中含有一颗蓝色的料珠，直径0.6cm，且两座墓的主人身上均漫撒红色粉末，这可能与当时的埋葬风俗有关^①。另从其他的出土资料及现存实物看，从春秋至两汉期间，东北地区出土的玻璃主要有珠、管及少量块形料饰，且以素面珠为主，未见于中原地区出土的璧、剑饰及蝉形口琖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及出土实物资料很少，仅见辽宁省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及辽宁朝阳的一次考古报道^②，墓葬时间均定为北燕。到了唐代即渤海国时期，东北地区的古玻璃器较唐代以前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质量上有所提高，并已出现在金属器物的镶嵌上。如，在这一时期的银带饰上就出现了玻璃珠的镶嵌，而用吹制法做的容器类则未见。

宋、辽金时期，受各少数民族不同文化及风俗的影响，本地区的玻璃数量有所增加，花样更加丰富，陆续出现了一些花、鸟、动物等形制的耳饰、头饰及带饰等。二次冷加工法的玻璃器已有所见，很多形制一直影响到元、明时期，这已在许多出土资料及现存实物中得到证实。

^① 详见白城地区文物简编第228—232页。

^② 详见《考古》1992年第八期第760页。



元、明时期，多种玻璃饰品在该地区已流入到民间。尤其是到了明代，玻璃数量及品种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一时期，热加工技术得以提高，而利用制玉法再进行二次冷加工的玻璃饰物已较多见，各种玻璃饰物大量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受到当时各类人群的广泛喜爱，一人有多件玻璃饰物的现象较为普遍。往往在一个墓葬中就出土了许多被包裹在桦树皮中的随葬玻璃饰物，这种现象也从侧面印证了明代玻璃饰物数量之多，百姓使用、佩戴之普遍。

十多年来，《文物》期刊中相继有几篇有关吉林省扶余县出土元、明、清瓷器的相关报道，而实际发现和发掘的明清墓葬群数量则远比这要大得多。《伯都纳文物古迹》一书是松原市宁江区（原扶余县政府所在地）文化旅游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编撰的。从书中可知扶余县（松原市所辖）位于吉林省北部，三面临靠松花江，自古以来就是百姓理想的生息之地，多年来不时有古代的墓葬被发现。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土地的开发及利用，大量的明、清瓷器在沿江一带被发现，尤以明代青花瓷和五彩瓷为夥^①。在出土的青花瓷当中，有些底部明确书写着“大明年造”纪年款及“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等晚明的伪托款，有的五彩瓷底部也有“大明年造”、“弘治年造”等款。许多出土瓷器得到了省、市、县三级文物部门的有效保护，并被省、市博物馆所收藏。还有部分被国家博物馆所征调，并列为馆藏，松原瓷在省内外已享有盛名。而伴随着这些瓷器同时出土的玻璃饰物，则基本可以认定为明代玻璃制品，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在《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一书里，由李青会先生撰写的“中国古代玻璃出土文物简编”一文，共汇集了有关出土古玻璃的报道计 554 起，然而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古玻璃出土报道仅 10 余起^②，可见此三朝古玻璃出土之少，其因应是明、清两朝墓葬（尤其是平民墓葬）遗存不多。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明、清两朝距今年代较近，而众多的明、清墓葬距地表仅一两米，最浅的只有几十厘米深，极易遭到损毁。随着明、清以后人口激增，人类居住及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以及土地的不断开发，当时众多的明、清墓葬则在人类的居住地不断扩展中而消失殆尽了。而众多的随葬器物，尤其是具有易碎性的古代玻璃则在劫难逃，变得极为少见了。这或许就是明代玻璃产量大、品种多、流行广，而历史遗存却很少的主要原因。而扶余的沿江一带在明代是“海西东水路”的主要区段，同时也是清代从奉天（沈阳）到卜奎（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这条交通线上的重要区段，所出明、清瓷器的地点均与上述两条交通线相吻合。由此可知，这些青花及五彩瓷器的渊源与交通驿站有直接关系，且由于沿江而少遭人为破坏，故墓葬才能保留至今。

香港的关善明先生所编著的《中国古代玻璃》一书中，将扶余出土的类似于其收藏的蓝色玻璃花瓣形簪头的同类花饰，推断为吉林地区生产使用的物品^③，笔者很赞同这一观点。同一个制造玻璃的模具，在玻璃液体高温状态下，不可能使用太长时间，换言之，同一模具的使用寿命绝不可能从宋、辽、金、元横跨几个朝代，历经数百年而一直延用到明代。而同一模具在较短的时期内，其产品数量也应是极其有限的。这也就限制了该产品的流行和使用范围。因而我们可以断定，从扶余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玻璃器，理应为明代之模具铸出，而同一模具铸出的少量制品，也只能在当时的扶余及周边地区小范围内流行使用，其产品样式则应带有地域特色。目前，除黑龙江肇源（同扶余一江之隔）地区沿松花江一带有少量出土之外，在国内的其他地区均未发现。因此，笔者认为最晚在明代，吉林的扶余地区就应该有了玻璃制作的作坊，其窑址有待于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得到确认，而上述推断已从现存的明代出土实物中得到证实。如

①详见《伯都纳文物古迹》第8、86、88、109、147~159、186~191页。

②详见干福熹等编著的《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附录一“中国古代玻璃出土文物简编”李青会汇编。

③详见关善明编著的《中国古代玻璃》第362页。



关善明先生收藏的两枚蓝色“吴牛喘月”牌饰就有着浓厚的地域特色，与笔者手中四种颜色的此类牌饰为同一模具所铸。该模具在用于铸造之前就已有残，故所铸牌饰上均留有完全一致的残模痕迹，至今尚未发现无此痕迹的同模牌饰。关先生收藏的一枚蓝色方胜形饰，也与笔者的饰品为同模，很可能均为扶余地区所出土^①。另台湾韩韩女士所编著《中国古玻璃》一书中所载的三枚玻璃乌饰及方胜等饰品，与上述情况相同，均属扶余地区出土的明代玻璃饰。

虽然，在国内其他地区明代玻璃器因其墓葬存留较少而罕见出土，但扶余地区出土的明代玻璃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明代玻璃制造技术发展较快，其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其他朝代，亦为清代玻璃制作技术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清代以后，由于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我国的玻璃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据东北地区出土资料及现存实物表明：在民间，除玻璃珠、簪等少量形制的饰品尚得以保留外，以往作为玉的替代品的玻璃饰物，如各种耳饰、头饰、璧、佩及各类花饰开始退出流行并逐渐被金、银等金属饰品所替代。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形制的陈设品及实用器皿则开始出现。一直到了清末民初，古代玻璃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退出人们的视线，新的玻璃制品全面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并成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用品。

几千年来，肃慎、濊貊、东胡三大族系的鲜卑、扶余、靺鞨、契丹、女真及蒙、满等民族在东北大地上创造着历史，同时也创造出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各具特色的物质文明，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存。古代玻璃饰品就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不可多得的历史遗珍。随着对其了解和认识的不断深入，古代玻璃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我们确信，古代玻璃以其存世之稀、形态之美的独特魅力，必将为广大收藏者所青睐，并将进一步展现其广阔的升值空间，成为未来收藏园地里的一朵亮丽奇葩。

^①详见关善明编著的《中国古代玻璃》第355页。

古代玻璃器 图谱





说 明

1. 为了便于表述和理解，书中唐代以前的各种玻璃饰品的流行年代均以中原地区的对应朝代来表示，如渤海国时期就用唐代来表示。

2. 由于一些古玻璃饰品形制延用时间较长，如琉璃珠中的某些品类从战国一直到明、清均在使用，二千余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故对此类藏品均标注其大致的流行年代。

3. 为了表示每件藏品的稀有程度，书中采用一至九星级来表示，每个星级又分上、中、下三档，以便更能准确反应其珍稀度。如九星上即表示目前该件藏品为孤品。

一星级表示较少

二星级表示少

三星级表示甚少

四星级表示较稀

五星级表示稀

六星级表示甚稀

七星级表示较珍

八星级表示珍

九星级表示甚珍

※ 九星上：目前存世量为孤品

九星中：目前存世量不超过五枚

九星下：目前存世量不超过十枚



古代玻璃器图谱·春秋至两汉



春秋末期 浅绿色玻璃管饰
 外径 0.60~0.67cm 内孔0.25~0.30cm
 长度3.80cm

受沁较重，表面满覆盖白色风化物，质地疏松、粗糙。用途：主要用于项饰。珍稀度：三星上



春秋末期 蓝色玻璃管饰
 外径0.67cm 内孔0.20cm 长度1.20cm

表面沁蚀严重，通体覆盖土黄色风化层，质地疏松、粗糙，局部微露蓝色。用途：主要用于项饰。珍稀度：三星上



春秋末期/战国初期 浅绿色玻璃珠饰
 直径0.65~0.95cm 内孔0.15~0.25cm 高度0.35~0.80cm

尺寸不一，表面风化严重，质地疏松、粗糙。用途：主要用于项饰。珍稀度：三星下



春秋末期 绿色玻璃玦
外径 2.20cm 内孔 0.60cm 厚度 0.50cm
表面风化严重，均覆盖一层较厚白色风化物，无光泽，内穿孔位置偏移和缺不同心，风化物脱落较深处露绿色玻璃质。用途：主要用于耳饰。珍稀度：八星上



战国中晚期 绿色六棱形玻璃珠
外径约 0.75cm 内孔 0.13~0.18cm
高度 1.30cm
外型呈不规则的六棱体，两端较中间略细，微成橄榄形，其中两颗表面风化较重。用途：主要用于项饰。珍稀度：四星中



战国晚期 浅蓝色玻璃珠饰
直径 0.40~0.55cm 内孔 0.10~0.15cm
高度 0.20~0.35cm
尺寸不一，上下面较平，沁蚀较轻，个别珠粒表面有光泽。用途：主要用于项饰。珍稀度：三星下



汉 口琚
长度 2.95cm 高度 1.85cm 厚度 1.65cm
蓝色不透明玻璃质地，底侧应是在未凝固时削磨掉一部分，而略呈平面，表面有龟裂纹和白色风化物。用途：口琚。珍稀度：五星下